

教育科学小丛书

改革面前的思考

●中学思想工作十二议●



北京日报出版社

装帧设计：白 隽

改革面前的思考

教育科研小丛书

北京日报出版社

书 名 改革面前的思考
主 编 姚 幼 钧 等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34号)

河南郑州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15.7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02—116—3/G0059

定 价： 1.60元

序

在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每一个立志为祖国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同志，都在认真地思考着：祖国的现代化、祖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明天，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课题，怎样让老一辈的热情、信念、学识在新一代身上延续，怎样让新一代以竞争者的姿态跻身于世界先进的行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去“挑大梁”……

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正是21世纪的建设者、竞争者，竞争，首先是智力的竞争，知识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这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更是我们教书育人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实现四化的宏伟大业要后继有人，而且要一代胜过一代，因此，为造就人才全面打好基础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肩上。经验告诉我们：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中，打好思想基础是育人成才的基本建设。有鉴于此，由姚幼钧同志和方道霖、司锡龄、刘凤梧、卫东等同志编辑整理，出版了这本书。

对这本书应如何看待，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怎样，这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评定。不过，可以肯定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在中学从事多年教育、教学工作，有丰富经验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而且他们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怀着深化教改、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人才的强烈愿

望来努力写作的。所以，这本书当能为广大的中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深化教改中提供有益的参考。我热切希望它能受到大家的重视。

韩作黎

一九八八年三月

作者简介

(按其文章在书中的先后顺序排列)

- | | |
|-----|-----------------|
| 司锡龄 | 中宣部教育局普教处付处长 |
| 方道霖 | 北京教育学院付院长 |
| 徐安德 | 北京市第五中学党支部书记 |
| 孙康林 | 北京市团市委付书记 |
| 史文炳 | 北京市委教育部付部长 |
| 陈心五 | 北京景山学校付校长 |
| 刘风梧 | 北京市第七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 |
| 陶祖伟 | 北京第八中学校长 |
| 徐汝庄 | 北京教育学院东城分院政治教师 |

改革面前的思考

司 锡 龄

虽然学校和过去一样，依然是开学、放假，上课、下课，老师教、学生学。但是现在，改革的声浪敲击着每个人的心弦，它把一大堆新情况、新问题推到我们面前，引我们思考，要我们探索，促我们抉择。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就很难完成教育任务。

自理、自立与引导管理

1984年，上海中学生中出现了自理、自立、自荐（当学生干部）的“三自”热潮。北京十八所中学的学生干部联合起来，举办“中学生文化节”。他们在天桥剧场举行隆重的开幕式，然后分几个点开展文化娱乐、科技咨询和交流经验的各种活动。他们请来了演员、艺术家、学者和社会名流。

对于这些活动，对于中学生这种强烈的自立、自理要求，应该怎么看呢？一些报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学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多方面才能。但不少学校的干部、教师却不以为然：“这样目无领导地蛮干怎么行？”

“上着课小干部就不辞而别去搞‘横向联系’，教学秩序怎么保证？”“学生都去参加文化节，得耽误多少功课？”有的同志甚至说：“你看‘大串联’又来了！”

文化节的具体做法怎么样，应该如何处理好活动与学

习的关系，都可以研究，但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学生为什么表现出这种强烈的自理、自立要求？应该如何处理自理、自立与引导、管理的关系？

既要培养学生的自立精神、创造意识，又要加强管理和引导，这个观点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但当前我们是管的多了，还是管的少了？是严了，还是松了？看法并不一致。

——传统的教育观念总是认为听话便是好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要求孩子“手背后，脚并齐”听老师话（虽然教委已三令五申，不要要求小学生手背后直溜溜坐一堂课，但至今收效甚微）。在中学里，有点跟老师不同的观点，冒一点尖，也往往被指责为“骄傲”“异想天开”。

——在对学生的全面评估上，往往是“以分取人”，对具有不同特点的学生，习惯于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这就会限制学生从多方面发展创造才能。在谈到文化节时，一位中学干部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学校有名初中三年级女生，她功课不怎么样，六、七十分，在群众中威信也不高，就是有点组织能力，领袖欲强，好出风头，表现自己……。”显然，这位领导是不大满意这名学生的。其实“领袖欲强”，还有点组织能力，为什么不予以正确引导让她好好“表现表现自己呢”？

——高考升学率的紧箍咒还高高悬在学校干部、教师的头上。学校领导有领导的难处，教师有教师的苦衷。很多同志想放开手让学生活动活动，但又怕影响升学率，只好作

罢。

——苦于没有方法。有些学校领导想让学生外出活动活动，但新形势下遇到了新问题：工厂、农村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往哪里去？一时还摸不到门径。有些生源较差的学校干部、教师说：“我们宁愿当高级保姆，没事也要把学生看到五点半放学，不然有的人会跑到社会上去犯错误。”对于这类学校的学生怎么样处理自理、自立与管理、引导的关系，也缺少经验。

应当说学生要求自理、自立，要求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培养自己的才干，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背景下出现的，中学生虽然不成熟，但近几年他们看到我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看到“四化建设”需要多规格、多层次的各类人才。他们要做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人”，强烈希望自己具有开拓和创造精神。他们要求社会能承认“中学生”这股社会力量，要求成年人理解他们，要求给他们表现自己各方面才能的机会。因此，对于学生自理、自立的要求，还是应该采取积极引导的态度。

要引导，就有个教育者转变旧观念的问题。是不是只有那些高分听话的学生是人才？学习成绩不那么好的学生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可不可以成才？著名的日本松下企业的人才录用标准是：除了要有好的品德外，根据其性格、气质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聪明、善于动脑的“文人型”；豪放、富于进取的“武士型”；体力充沛，能活动的“运动员型”。以上三种人，大体各占三分之一。要让不同类型的人

都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前面提到的那名初三年级的女学生，既然她有“领袖欲”，又有组织能力，让她“表现表现”，又有何妨；当然对其缺点，也应当引导她逐步改正。

要引导，就要在理解学生的基础上与他们“说得进话”，引导他们把事情考虑周全些，做事要适“度”。

在总结“中学生文化节”的座谈会上，几名学生干部兴高采烈地谈起他们的收获、体会。他们说：“这种文化节好得很，我们今后不仅一年搞一次，还应该每月搞一次。”小干部们显然把事情看得过份简单了，只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一个月搞一次”那得有多大工作量？那怎么受得了？一般说来，中学生的活动（包括学生喜欢的“文化节”之类活动）还是应该以校内活动为主。大的、“横向联系”的地区性活动只能是少量的，而且是在有关领导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只要理解学生，与他们“说得进话”，这些道理学生是能接受的。

要引导，还有个教育者劲往哪儿使的问题。上海一所重点中学一个高中班，班主任与全班学生一起搞学生自理、自立、增长才干的试验。全班48个人，几乎人人都有职务，人人参加班级管理，学生搞得很好，班主任只做辅导员。这位班主任说：“我就是给他们做点咨询工作，有问题帮他们出出主意。”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这很好。有条件的地方，教师、干部应当在“退下来”之后更深入地做些思想工作，帮学生成才，教他们做人。上述重点学校的那个班级，教师可以帮学生树立更高的社会理想，使他们打好更坚实的

思想基础。

活跃思想和严格管理并不矛盾。就是在中学生中，也应该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勇于创新。但同时在校风、校纪方面又应该严格要求。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品德。

我们有的学校在管理问题上容易忽左忽右：前几年，有的校长、主任站在大门口对凡穿牛仔裤者把住不准进校，但有的又提倡穿牛仔裤，前几年有的学校严禁学生跳迪斯科，现在忽然又提倡跳迪斯科，甚至把课间操停下来，以跳迪斯科而代之。其实视牛仔裤、迪斯科为“洪水猛兽”大可不必，用“迪斯科”代替课间操，也令人费解。

在教育管理中，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弄清：学校和社会不同，有些社会上允许的事情，学校里不见得合适。美国电影是分出“级别”的，哪些允许少年儿童看，哪些只准成年人看，都明确标出。日本更明文规定小学生不准使用化妆品。这方面的道理不仅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弄清楚，而且应当使学生明白，还要向家长和社会宣传，以便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一致的要求，造成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环境，这也是改革开放形势下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学生服装而论，当然不应在这方面提出过严的要求，但学生正处在身心成长时期，还应以朴素大方、实用为宜。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统一的校服，最近中央领导同志也几次提出，我国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也应搞校服，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校风、校纪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在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学校领导应当考虑怎样确立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校的模式。外国的东西应当参

考、借鉴，但不应照搬。美国学校里强调独立性反对依附性；重视现实、讲究实际，赞赏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反对墨守成规和不求进取等，都值得我们学习，但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不提出纪律要求等等则是不可取的。

竞争与为人民服务

在1986年举行的“全国十城市青少年讲演比赛”中，一名讲演者抽到了一个题目《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在略事准备后，他走上讲台：

“我最佩服的人是谁呢？就是我自己！”

台下一阵热烈掌声。

节目主持人请一位决赛的落选者谈谈他的感想的时候，他说：“虽然这次我落选了，但是我相信自己有讲演才能，我是工人，我坚信自己会成为工人演说家！”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全面评价这些讲演和发言的内容，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八十年代的青少年为什么一改老一辈遇事总是“谦虚一番”的精神状态，而是那么自信，那么充满竞争意识？

——这是时代的产物。中华民族正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振兴，研究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的专家们早已指出：在新技术革命挑战面前，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升降沉浮，要看它有没有担负时代使命的人才，这“人才”必然是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人才！

——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

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
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
的基本条件。（赵紫阳同志报告单行本，第12页）

商品经济就要求有新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
和开拓进取观念。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旧观念和习惯就需要改变。例
如，所谓“谦虚”，就需要重新全面评价。在一些国际学术交
流场合，我们有的学者不管什么情况，上来总先“谦虚一番”：

“在座的很多专家，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没把
握……”在外国人看来，你是无能，是懦夫！无数事实说明，
该争就得争，我们的工作应该建立在科学态度上，而不是表
面上的谦虚。《北京晚报》曾刊登过这样一篇通讯《蚂蚁，
十万火急》，说的是北京某衬衫厂名牌产品销往某国，有一
天忽然接到该国打来的加急索赔电报，声称我出口衬衫中有
蚂蚁，随后用小瓶寄来了蚂蚁。我们的厂长、技术人员、工
人没有惊慌失措，更不是“谦虚”地“承认下来”。他们一
方面认真地停产检查所有工序，在证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带着蚂蚁登门到中国科学院找昆虫专家鉴定，这蚂蚁到底是
哪儿来的？经专家鉴定，这种蚂蚁生活于索赔的那个国家，
历史上我国长江以北从未发现过。在真理在胸、证据在手
的情况下，与对方谈判，在出示证据后，对方非常尴尬，承
认蚂蚁不是从中国流去的，他们只好红着脸说：“请多关
照。”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要考虑如何让下一代人适应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如何在未来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对四

化建设有更多的贡献。长时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由于大家习惯于“大锅饭”、“铁饭碗”的生活，在看人标准、用人标准上，都难免存在这种模式的思想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情况必然会发生变化。这就要求下一代人具有更强的依靠自己，在工作中竞争的观念，而不是“躺”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上。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培养下一代的竞争意识。

1986年8月18日《经济日报》和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座谈会，邀请国家体委负责人袁伟民、徐寅生和知名教练与企业家一起座谈，议题是：“体育竞赛与企业竞争有无共同规律可循？企业改革可以从体育工作经验中借鉴些什么？”与会者谈到：“竞争是体育的杠杆，也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商品经济的较力场上要凭高水平、高质量才能取胜。”袁伟民在会上强调：要选拔敢于和善于同变化了的世界进行挑战的人。他举了培养郎平的生动例子。他说：

“选拔什么样的人？一种是听话的，对现在工作熟悉；一种是不大听话的，但知识结构适应未来挑战的人。我宁用第二种人。”说的虽然是体育比赛和办企业，但对我们培养人，同样很有启发。

话说到实际工作中来，我们怎样注意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呢？

——应该给学生讲清大形势，用邓小平同志八十年代“三大任务”，用“翻两番”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思想武装学生，使他们能从这个高度上认识自己，在这个“大坐标系”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并确定如何培养自己的智力结构和

思想品格。

——在实际工作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在竞争中需要的品格。

有的老师常常习惯用“骄傲”、“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这些词批评学生。而实践证明，那些不循规蹈矩，敢于创新，有成就的人，往往在青少年时期被人视作“骄傲”、“狂妄”。

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上，我们很长时期以来更多地强调了“集体主义”，但是对于如何发挥“个体”的才能，却研究得不够。只有让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群体”也才能表现出它的力量。只要学生能够正确处理个人——集体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允许他发挥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自由，就应当允许他充分地“表现自己”。

要求学生有竞争观念与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矛盾的吗？不是。

首先，应该用一个大的方向把两者统一起来。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应当要求下一代朝着这个高目标前进。但是，为人民服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定内容。在现阶段，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了，才能达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目的。我们竞争，发挥个人的作用，“争强好胜”，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这个道理应该让学生明白，并与自己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其次，我们的竞争，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背景下的竞争，它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更高的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象

资本主义那样贪婪地聚敛财富，把别人踩在脚下。因此，我们在竞争中就有很高的道德。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年轻一代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富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祖国正处在蓬勃的上升时期，改革、开放为我们指出了诱人的前景，年轻一代正是“各显神通”大有作为的时候。

第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觉悟层次，只要他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应该允许他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作为高标准要求，我们还应该提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无数勇于改革、开拓的先进人物给我们树立了这方面的榜样，他们的事迹也雄辩地证明竞争与为人民服务是统一的。

全塑汽车的发明者和定型生产的组织者中华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唐锦生的事迹，令人感动。他把28万元的技术转让费全部交了党费，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为的是组织全塑汽车的定型生产，他遇到重重困难决不回头。为什么？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中国汽车工业打翻身仗！”唐锦生同志是一位35岁的年轻人，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的公司遇到了各种困难：账面上只有90元钱了，工厂几百号人每天一律盐水泡饭……这时候，我想到在改革中太需要那种不怕千难万险的长征精神！”是的，在改革、开放中，路不会总是平坦的，在竞争中会有风险，“伟大的目的才能产生伟大的动力”，要在竞争中，在国际经济竞赛这个大“竞争”中获胜，我们的下一代必须有很强的竞争意识，而竞争取胜的力量源泉便是为人民服务！

横 比 与 纵 比

在山东省一所重点中学，我和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交谈。

“我看电视剧《血疑》感到人家日本也挺好。你看人家多有人情味，也有舍己为人，互相帮助。咱们改革还不是学人家？”

“那你看中国和日本还有什么区别没有？”

他想了想，“有，中国有路不拾遗，这点日本没有。”
(其实“路不拾遗”在日本也不是绝对没有。)

“你这些想法对学校老师说吗？”

“不说。”

“为什么？”

“一说，他不就给我讲一通大道理。什么要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呀，什么不能忘记旧中国的苦难呀，什么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呀等等。”

这名学生的具体想法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横比和纵比的确是我们在思想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不容“绕过去”的问题。

先说“横比”。

广大青少年不满足于拿今天的成就与旧中国相比；他们要求横着与当今世界相比，特别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这未必是坏事。它反映了青少年一代不满足现状，要求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至于他们对我国国情缺乏了解，对资本主义缺乏全面的、本质的认识，

对事比较偏激，那是引导问题。

我们不妨组织一次以“谈谈当今世界”为主题的活动，让学生通过从各方面了解的信息，谈谈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济管理制度、对我们有益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等。这只能会更加激起大家改变祖国面貌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学生们常常提问的为什么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反而缓慢的问题，则应引导学生对问题做全面的深入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较快，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和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等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分析，我们做思想工作的人，应当读一读。

“横比”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穷”的问题。作家王蒙在他的一次报告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很值得人回味：

“我们国家穷，穷怎么办？我们的热血青年都是爱国的。你出个主意，象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那样，突然地下发现大批石油，一下子富起来。行吗？莫说我们迄今为止还没发现那么多、那么大的油田；就是有了十几、几十个大油田，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能一下子成为暴发户？有人说中国人太多，要向外国移民，行吗？越南向外输出三百万“船民”，就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中国甬说少三百万，少三千万人管什么？走三亿许管点事，往哪里去？有人说我自己走，找个富地方，那也许行，但你能把祖国也背出去？”

画家范曾说过一段话：汪精卫是亲日派，是汉奸，按说他对日本够“效忠”的了吧，日本没有一个汪的纪念碑。周